



1949年1月15日清晨,解放天津的炮声已经远去,长达40天的攻城战役结束,城市一片冷清。枪声甫停,居民们纷纷涌出家门,相互传告“进来了,进来了!”“进来了!”这三个字,表达了人们对于战事终结的喜悦,也表达了人们对于旧时代终结、新时代到来的喜悦。

我躲在楼下憋了几十天的烦躁,立即云消雾散,我匆匆跑出院子,随着人流奔向大马路。听早出来的市民说,先头大部队已经往“下边”冲过去了,城里已经解放。“下边”就是原来的租界地带,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还没有投降。我真想去“下边”看看,但是听见还有远远的枪声,心想算了,还是等着胜利的消息吧。

就在此时,街上有吆喝声传过来:“《天津日报》!”奇怪,天津只有《国民日报》《益世报》,怎么突然有了《天津日报》?原来的《益世报》馆在“下边”,解放军还没到“下边”,《天津日报》怎么就印出来了?后来知道,是报馆工人接到纸型后加印出来的,天津解放后第一批投入生产的工人,就是天津日报社的印刷工人。

随着市民们一起,我立即跑去抢到了第一份《天津日报》。报纸是四块版面,第一版上印着领袖照片,第二三版有军管会通知等各种消息,第四版是副刊。人们一边看报,一边往家跑,好把这份报纸拿给家里人看,我也是把报纸拿回家的第一人。我才跑回家,叔叔、哥哥们也相继跑了回来,带着他们抢到的《天津日报》。《天津日报》创刊号,我家至少有了四五份。

自此,每天早晨,我早早地跑出门去抢新出版的《天津日报》,后来有了订报,就可以在家里等着看报了。我自幼喜欢作文,开明书店有一个小刊物叫《开明少年》,我在上面发表过文章。自从有了《天津日报》,报纸上的副刊就成了我投稿的地方,最先投的小文章只是一种自命不凡,远达不到发表水平,实际上就是给编辑添麻烦。好在那时候编辑对于来稿都非常重视,每次投稿被退回来时,都有编辑们写的退稿信,信中先是肯定你的热情,再说明没有被采用的原因,并指出文章的缺点。就是在这种给编辑找麻烦的过程中,我逐渐提高了写作水平。

后来我到师范读书,看过一部电影后颇受感动,信手写了一篇文章,寄给了《天津日报》副刊。几天后,在学校图书馆看报,大吃一惊,我本来没抱任何希望的这篇小文章,居然在《天津日报》副刊发表了,这一下,学校轰动了。一个同学告诉我,校长要你去办公室。我想,这几天我没捣乱违纪呀,去就去吧。进了校长办公室,我鞠躬立正。校长看着我像是笑了一下,只说了一句话,回去好好上课听讲。我答应一声,又鞠躬出来了。因为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,我收到《天津日报》聘我为通讯员的小卡片。报社送给我一个大本笔记本,还经常赠送我电影票,新电影《八女投江》,我就是去美琪剧场看的。我在报社听过黄松龄先生的报告。听报告的时候,有人看到了我的那个大本笔记本,很是让我骄傲了一回。

上世纪50年代,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有两大贡献在中国文坛引起反响,一是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,其中许多人写出了精彩作品。作家阿凤的散文成为新文学散文创作的重要篇章,同时代的工人作者也写出了重要作品。这一代工人作者都是我的好友,他们是中国新文学历史的一个重要创作群体。第二就是由孙犁先生培养扶植起来的河北乡土青年作家,后来被称为“荷花淀派”的作家群体。这些青年作家尽管后来受到不公平对待,但文学新时期之后,他们成为重放花朵的一代。

原本,我也属于第一代青年作家之列,只因我受到运动株连比他们要早,所以直到1980年才彻底平反,重新开始文学创作。上世纪80

年代开始拨乱反正,我在工厂的处境开始好转,我由一名车间勤杂工,被调到工厂生产管理科做生产管理管理工作。拨乱反正的暖风吹醒了我一直坚持的文学梦,提早回国的同时代文人,也都鼓励我开始文学创作。于是,我在许多“问题”依然缠身的境况中,偷偷地开始了文学写作。1980年8月,我把两首短诗投寄给《天津日报》文艺部,我知道,在那个年代,报刊选用文学作品前,要对作者进行政审。出乎意料,一天早晨,我打开《天津日报》,居然看到“文艺周刊”发表了我的那两首诗,当时我真为“文艺周刊”的编辑担心,你们不怕“犯错误”吗?直到多年之后,我才知道是当时的编辑宋曙光先生从来稿中,发现了我的诗稿并立即送审,由“文艺周刊”主编李牧歌签发后刊登出来。

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发表我的诗作,反响很好。朋友们来信和我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友谊,鼓励我写出更多的作品。自此,我放下思想负担,开始文学创作,写出了后来的《无名河》等诗歌。《天津日报》的老朋友邹明先生,约我将这些年的生活经历写出来。不久,我将一部长达几万字的回忆录送交邹明,他看后呈交《天津日报》总编辑石坚。石坚同志审阅后,批示可以发表,这就是后来发表在《文艺》(双月刊)上的长篇回忆录《十劫须臾录》。文章发表后,许多老朋友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、慰问。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,我开始学习小说写作,并受到朋友们关注。《天津日报》的宋安娜女士邀请滕云先生和我,为此做过一期颇有影响的“津味小说三人谈”专版,在《天津日报·文艺评论》版刊发。文章首先肯定了我的以天津市井人生为背景的文学写作,并提出了津味文学的理论概念,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,才日渐成熟了津味小说的生存发展土壤。应该说,津味小说是从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起步的。

这种创作与评论面对面的交流,是对我的津味小说创作一次有力的触动与鼓励。随后,我在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连续发表了多篇描写天津地域、人物、事件的津味小说,颇受好评。天津有志于津味小说的作家大有人在,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的倡导和推动,使津味小说写作队伍不断壮大,几年时间,培养了许多津味小说作者,我本人更是这支写作队伍的重要成员。宋曙光先生还组织过多次津味小说征稿活动,促进了津味小说的发展,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成为刊发津味文学作品的主要阵地。

时至今日,我从一个投稿的青年学生,成长为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的重要作者,几十年的光阴结下无比深挚的情谊。在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创刊3000期之际,我回想自己的许多诗歌、散文和小说,都是发表在“文艺周刊”上,并与几代编辑成为朋友,这是我的幸运。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,我更是看着《天津日报》长大成人的。一个人和一份报纸系结着一代人的命运,一个人和一份报纸见证着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。我和《天津日报》的深厚渊源,见证了我一生的生活历程。

# 我和《天津日报》

林希



从天津的好友处得知,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就要出满3000期了,希望能写篇文章助兴。一份报纸的文艺副刊能够出满3000期,值得庆贺。为此,我想到了与天津一些难忘的缘分。

提起天津话题多多。我记得从军云南的时候,空军有一批天津的战友曾经和我一起住在野战医院里,有一位战友比我小几岁,但是热情活泼,而且擅长武术。我在住院期间专门向他学习了一通少林长拳,可惜很快这套功夫就被忘到了脑后。探亲回家的时候,这位战友还专门让我到天津他的家中探望了一下他的父母,还有他在北京无线电厂工作的哥哥。他哥哥的厂在酒仙桥,我记得当时我骑车骑了好一阵,那是一个保密工厂,我终于见到了这位战友的哥哥,也看到了酒仙桥保密工厂巨大的规模,只不过现在它已经变成了艺术高地“798”了。

之后到天津的机会越来越多,因为我由部队转业到了《文艺报》,我曾与吴泰昌同志一起去看望孙犁老前辈。在孙犁老前辈朴素的住宅里,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同行的泰昌和他很熟,在聊起文坛往事的时候,泰昌悄悄地拿出录音机放在了桌子上。我看到那一刻,孙犁老前辈的眉头皱了皱,他好像不太喜欢录音,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。那次采访我记得还探问了袁静、鲁藜等几位天津的文学老前辈。

后来我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,天津的许多官请我和孙幼军去为一帮孩子们讲儿童文学。孙幼军是童话大家,讲童话时妙趣横生,我讲的是儿童诗创作。记得那时候天津的孩子们热情又可爱,在分手的时候,一个小姑娘还送了一本她珍藏的书给我,这是一本童

话书,名字叫《戴帽子的猫》,我至今还记得送书给我时那个小女孩亮晶晶的眼睛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,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办有“儿童文学作品专版”,是由臧克家先生题写版约,约为每月一期,责任编辑宋曙光热情约我写过儿童诗,从此结下诗缘。

以后还有若干次出差天津的机会;天津日报社举办孙犁老前辈

他曾经在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。只可惜答应我们当团长的王蒙先生,那时正好患了痛风,但是他仍然坐着轮椅被人推着参加了我们的轮椅。我们到了杨柳青,看到了独特的天津风情,那个时候,天津已经离上世纪70年代我去战友家时有了巨大变化,因为这期间经历过历次深入津,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体制改革,所以天津的变化几乎可以说是一日千里。

天津人热情好客,说话幽默,但是天津的口音一直让我感到有些与众不同。终于在一次和天津作家朋友肖克凡的交往中,他解除了我的疑惑。他说,天津话既不属于北方方言,又不属于南方方言,是因为当年李鸿章的准军驻防在天津一带,士兵们都是安徽口音,所以说天津口音里边有很大一部分是安徽的方言。肖克凡这么一解释,我才顿悟恍然大悟,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精彩的话剧表演艺术家和相声大师,这应该是一个南北语言混杂的特殊高地,并且融合出各种津味的一座神奇的城市。

天津有小站稻,天津有十八街大麻花,天津有狗不理包子和沙窝萝卜,天津还有很多让人垂涎的美食。每次到天津就想起我的岳母,一个少女时期从天津走出来的八路军女战士对她家乡的回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天津和我是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啊。这里面当然也有与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的缘分,我在这个版面上发表过诗歌、散文,记得建党百年时,我还写过一篇《心香一瓣祭麦新》。在它迎来3000周年纪念之时,谨寄上我的祝福与敬意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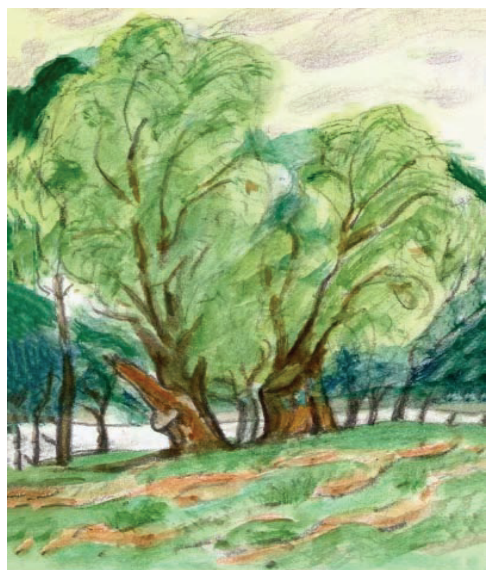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曾任天津市作协书记的张洪义,是在内蒙古阿尔山插过队的时候,他性格爽朗,热情洋溢,他曾无数次邀请我们到他生活过的阿尔山去参观访问,因为他是阿尔山市的第一任市委书记。可惜在他生前我一直没有完成或者兑现去阿尔山访问的诺言,直到去年才真正到了阿尔山,到了那一座美丽的边疆小城。

关于天津还有一段往事,我十几年前在国防大学读战略研讨班的时候,我的班长董将军是当时的天津警备区司令员,他曾经带领我们一个班的同学访问过天津,参观过天津几个著名的景点,天津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美好的印象。

对天津记忆最深的应该是2004年,张立昌同志当时是天津市

# 天津往事

高洪波



绿水青山 (水彩画) 罗雪村

地上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。

孙犁编辑“文艺周刊”,是有自己的编辑思想的。比如,他写过一组《编辑笔记》,其中就对作者们表达过这样的忠告:应该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,包括平凡的日常生活。但是,“在描写日常生活的同时,应该把生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重大节奏表现出来”。他强调说,“就算文字的风格有如合奏中的粗细乐器,表现得有所不同吧,但无论是一支箫管,一面铜锣,在表现生活大乐章的时候,都不能忽略表现那决定乐章精神的主要旋律”。

再比如,他认为编辑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修养,“要浏览百家之书,不怕成为一个杂家”。他在《关于编辑和投稿》一文中说,作为编辑,一方面,“要熟悉社会各行各业的生产、生活和语言。要熟悉农村、工厂、部队,包括种地、生产、作战的具体知识。不知道这些,就没法审稿,或改稿出笑话”。对此,他在文中举出了很多具体的“改出笑话”的例子;另一方面,当编辑“要参考前人编辑刊物的经验,也包括反面的经验”。他还给出了一些具体建议,比如,“先学习鲁迅主持编辑的刊物,如《语丝》《莽原》《奔流》《萌芽》《译文》等。应该学学他在每期刊物后面所写的‘后记’”。

孙犁一生服膺鲁迅,认为鲁迅先生是“真正的一代文宗”。在他看来,“书,一经鲁迅作序,便不胫而走;文章,一经他人选,便有了定评,能进文学史;名字,一在他的著作中出现,不管声誉好坏,便万古长存。鲁门,是真正的龙门”。孙犁甚至断言,上溯下延,几个时代,都难以找到可与鲁迅比肩的人,梁启超、章太炎、胡适,都略逊一筹。也因此,孙犁从年轻时一直到晚年,都对鲁迅推崇有加。青年时他写过《少年鲁迅读本》《鲁迅·鲁迅的故事》《鲁迅选》等长文和单行本。孙犁自己爱买书、读杂书,有时也会根据鲁迅日记里的线索,去搜寻、购买和阅读。当编辑,孙犁也主张多向鲁迅学习怎样做编辑。他认为:“从鲁迅编辑刊物中,我们可以学到:对作者的态度;对读者的关心;对文字的严肃;对艺术的要求”。

1983年,“文艺周刊”即将出刊1000期前夕,孙犁写了一篇文章《我和〈文艺周刊〉》,不仅记述了他与这个副刊的渊源,也向继任的编辑们提出了五条建议和希望:一,“文艺周刊”应该永远是一处苗圃,应该不断地扩大新作者队伍;二,虽然那是地方报纸副刊,也应该努力办出一种风格来,并用这种风格去吸引作者,影响文坛,招徕好作品;三,强调现实主义文艺风格,重视有生活、有感受、手法通俗,主题明朗,切切实实的文艺作品;四,对作者既要热情扶植,又要严格把关稿件质量,不能迁就;五,编辑要不断提高文学修养,提高编辑水平,要经常出去跑跑,联系作者,不要只是坐在桌前,守株待兔。这五条希望,实际上也是孙犁一贯的编辑思想、情怀和作风的表露。

## 三

熟悉新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,正是围绕着孙犁,以及在他编辑的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这个著名的副刊上,不仅成长起了天津地区的一批新中

国的工人作家、工人诗人,更是团结了华北地区的一批擅长创作以平原、运河和白洋淀为背景的乡土题材的青年作家,渐渐形成了一个后来被研究者们称之为“荷花淀派”、风格鲜明的文学流派。

这些作家的成长和这个流派的形成,孙犁编辑的“文艺周刊”,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初创办的《文艺》(双月刊),功不可没。一个副刊园地,一本双月刊,事实上成了“荷花淀派”作者们茁壮成长的沃土和大本营。但孙犁从来没有“贪天之功”,他似乎也没有完全承认,有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所谓“荷花淀派”。他在给《从维熙小说选》写的序里,说到这样一个细节:“最初,他(从维熙)给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投稿,有一次到报社

# 荷香清且远

——孙犁先生的编辑情怀

徐鲁



来了,我和他们在报社的会议室里见了一面。我编辑刊物,从来不喜欢把作者叫到自己家里来。我以为我们这一行,只应该有文字之交。”“只应该有文字之交”,这也是孙犁的编辑美德之一。他在给《刘绍棠小说选》写的序里,写到了另一个细节:“前些日子,我写信给绍棠同志,说:‘我并不希望你们(指从维熙和其他同志),老是在这个刊物(指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)上发表作品。它只是一个苗圃。日它见到你们成为参天成材的大树,在全国各地矗立出现时,它应该是高兴的。我的心情,也是如此。’”可见,孙犁编辑“文艺周刊”、关注与支持《文艺》,一直都是海纳百川的,而且注重办成能使更多小树苗“成活”的“苗圃”。

1980年9月12日,孙犁写了一篇短小的散文《成活的树苗》,记录了自己亲历的、养活了一株马尾松树苗的故事。但“成活的树苗”似乎只是一个比喻,他写这篇散文真正的意图,是在谈编辑的意义。他先总结了马尾松树苗能成活的原因:“松土、加砂,不太毒的阳光,同施于三株,而此株独活。可能是它的根,在路上未受损伤,也可能是它的生命力特别旺盛。我们还是不要贪天之功吧,什么事也不要贪天之功。”然后,他的话题转向了编辑这个行当。

他举了“刘、从二君”做例子。文章里没有写明二君的名字,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“二君”指的是刘绍棠,从维熙。孙犁对两人说:“近几年,人们常说,什么刊物,什么人,培养出什么成名的作家,这是不合事实的。比如刘、从二君,当初,人家稿子一来就好,就能用。刊物和编者,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,说是培养,恐怕是过重了些,是贪天之功,掠人之美。我过去写了一篇《刘培养》,我想写一篇《再论培养》,说明我经历了几年风尘,在觉悟方面的这一点微微的提高。”

在这里,孙犁实际上是指出了,当编辑应该拥有一种不“贪天之功,掠人之美”的编辑胸怀和编辑美德。他在后来写的一篇《谈名实》里,再次谈到了这个观点:“比如说一位文艺刊物的编辑(我有两篇文章,都是谈的编辑),对于一位作家,无论有多少费心之处,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帮助,还谈不上是培养。一位评论家,对一篇小说,无论你的评论多么及时,多么正确,其作用也不过鼓励助兴,也谈不上栽培。”他说,《谈名实》“就是我要写的《再论培养》”。这些言论,可以说是一位编辑的“人间清醒”。

## 四

像在战争年代编辑《平原杂志》一样,1979年《文艺增刊》创办后,孙犁先后为《文艺增刊》(《天津日报·文艺增刊》)《文艺增刊》开辟“创作经验”专栏的几点说明》《〈文艺增刊〉缩短刊期,更易刊名启事》等文字。从这些编辑“应用文”里,我们可以看到,他对编辑思想和编辑追求是一贯之的。比如,他对“创作经验”一类稿件的要求,立场鲜明:“一切泛泛之谈,故弄玄虚,自我吹嘘之作,虽名家不取;一切言之有物,甘苦亲历之谈,虽无名必录。”又比如,他对鲁迅编辑经验的推崇:“回忆鲁迅先生当年,于介绍世界名家之创作时,必要求附译其创作经验,盖因创作经验,可以反映出艺术真实规律,成功者固可作为动力,失败者亦可作为法戒。先生所反对者为‘小说学’,为‘创作方法’,非反对创作经验也。故本刊专辟此栏,并重点经营之”。

孙犁编辑,从不好高骛远,攀附名家,好大喜功,而是本着一贯的“布衣情怀”,如老农耙地,精耕细作,实实在在,在种豆种瓜。1981年,《文艺增刊》更名《文艺》(双月刊)时,他在启事里写道:“本刊以刊叙布衣之素质,自量不足与浓抹时妆者斗艳争奇。页码单薄,亦不足侧身于大型期刊之林。然仍希以其微薄之力,无间寒暑,不计阴晴,继续在此小小园地,扶犁执耒,播种耕耘。刊物改名,究系形式,宗旨不变,朴实无华。”

这份启事当然有自谦的成分,但并不妄自卑薄,而是从骨子透出一种自在与自信。孙犁的编辑思想里,充满了“鲁迅风”,与鲁迅当年的编辑作风一脉相承。

## 五

最后写点“题外话”,讲一讲我与“文艺周刊”的缘分。我最早阅读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,是在四十年前前的大学时代。那时候因为特别喜欢“荷花淀派”作品,一到图书馆就去翻阅《天津日报》,寻找每期的“文艺周刊”。后来参加工作了,又订阅了《文艺》(双月刊)。无论是“文艺周刊”,还是《文艺》,所刊发作品的清新、明朗和朴素风格,对我学习写作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。

我第一次向《天津日报》投稿,是在1995年。当时,宋曙光先生在编辑“文艺周刊”,承蒙他青睐,为“六一”儿童节向我约稿,我投寄了《儿童诗四首》,都是短小的,每首不足10行的诗。这组儿童诗刊发后,很快被上海《儿童文学选刊》选

载,还意外地荣获了第15届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。如今,这个奖项已更名为“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”。

记得是2014年吧,宋曙光先生从电视节目上,看到湖北有一个姓王的小伙子,开了一家名叫“百草园”的小书店。小王参加某省卫视的一档《最强大脑》节目,用自己的记忆去挑战“书架检索”的技能。节目组从小王寓目的三十万册书籍里,随机挑选出三千册放进了演播室,然后请观众任意取出一本书,让他报出这本书的价格、作者和出版社的名字,小王竟能一一答对。曙光先生特意从天津打电话给我,让我去找一下这家小书店,写一写这个小伙子的故事。“为什么一定要去找一找、看一看呢?因为像这样爱书的年轻人,少见!”曙光先生做事认真,随后又让编辑白丽打电话提醒和督促我。于是,我就循循去找到了这家小书店和它的主人小王,写了一篇《小书店之美》。“满庭芳”副刊几乎用了大半版的宝贵版面,刊登了我的这篇文章。

身为副刊编辑,他们竟然还能亲自去为作者留心发现和新鲜的故事素材。后来一想起这件事,我就觉得特别温暖和感动,这不正是孙犁先生所倡导的,编辑要经常联系作者,“不要只是坐在桌前,守株待兔”的编辑作风,在“文艺周刊”编辑中的实际体现吗?这种编辑情怀,也正是孙犁的编辑情怀的传承与延续。

2022年,我创作出版了一部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题材的长篇小说《小菊的茶山》。我写这部作品,就是采用了我心仪已久的孙犁先生那种半纪实、半虚构的小说文体。我读孙犁的《琴和箫》《荷花淀》《芦花荡》《采蒲台》《山地回忆》《蒿儿梁》《纪念》这些短篇,甚至到他晚年创作的“芸斋小说”系列,其实很难分清这是虚构的小说,还是真实的纪实故事。“我”(作者)自己的足迹、身影、声音、行止、所思所感,散落在每一篇短篇小说的字里行间。孙犁在《山地回忆》写到一个细节:“我在太行山区打游击的日子里,有一天来到一个熟悉的小村外的小河边,看到在河边洗菜的小女孩端着菜走了,我在河边洗了脸。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‘踢倒山’的鞋子,冻得发黑的脚,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,这水,这沙滩,永远不能分离了”。我对于自己生活过多年的幕阜山区的感情也是如此。当我在睽违多年之后,重新站在那里的河畔,看着暮色里的渡口、茶亭,还有远处的山岭、田畈和一座座灯火初上的小窝……那一段时间,我的心里也涌上了与孙犁在《山地回忆》里同样的感受:这些都像是我的故园一样,分别得再久,也永远不会失却和淡去那份温暖、那份亲切的感觉。我甚至感到,我和这里也是永远不能分离了。

我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日子里,头脑里不断地闪过当年在“文艺周刊”和《文艺》(双月刊)上,读到过“荷花淀派”作品的影子。近日,得悉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即将迎来3000周年纪念,特写了这篇《荷香清且远》,以表达我的美好祝福。

2024年9月7日,农历白露,武昌梨园

# 文艺周刊

第三〇〇二期  
纪念专版